

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与现实路径

李丹

(厦门大学, 福建省, 厦门市, 361005)

摘要: 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既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深远的历史基础, 也具备厚重的人文基础、现实的外交基础。在具体实施时, 可以从加强语言互通、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文化理解、培育文化共性、增强文明互鉴等方面着手,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 “一带一路”; 文化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文交流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是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延续、继承和发展, “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传承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精神, 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人文维度, 为文化共同体构建创造了现实条件。“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的位置在哪里? 文化扮演着什么角色? 发挥着什么作用? “一带一路”是文明之路, 它承载着丝路文化传统, 传递着共同人文精神, “一带一路”建设是文化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要靠文化建设, 文化是纽带, 是桥梁, 是连接沿线国家历史记忆和民众现实情感的内在粘合剂;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要靠文化来检验, 民心相通是试金石, 人文联通是最高层次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最终赢在文化认同和文明共享;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需要共同利益的基石、共同责任的支撑, 更需要共同文化的凝结, 汇聚人心才能将愿景转化为现实。因此, 文化既是基础、条件, 也是保障、归宿。如果说经济活动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速度规模, 那么文化作为则决定“一带一路”建设能否行稳致远。“一带一路”共建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共建, 或者说是通过文化共建、借助文化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必然包括文化共建, 共建的结果必将意味着某种共同文化乃至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近几年来, 学术界围绕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文明互鉴等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论述与研究。已有学者尝试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界定内涵、要素。徐琴、孙绍勇认为,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由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生活和文化遗产构成, 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古代丝绸之路记忆为基础,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丝路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有机体。^[1]谭文富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应是人类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本来就是一条文化‘带’, 一条文化‘路’。只有实现文化上的互知、互通、互信、互补、互融, 即构建文化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才能真正落到实处。”^[2]李希光在论述“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关系时指出, 文化建设是手段, 文化共同体是目标, “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 争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3]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推进, 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突显, 对此的研究也会更深入细致。本文拟就“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构建问题进行探讨, 以抛砖引玉, 将如何发挥文化在“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的作用这一论题引向深入。

一、“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可能

对文化共同体的关注其实与对“共同体”的关注一样久远。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

为共同体是人的意志的表现，是建立在共同记忆之上、由各种相互关系组合而成的综合体。^[4]本尼迪克·安德森认为，“共同体（民族）的产生依赖于一种想象，而这种想象的产生源于文化的同源性”^[5]。在国际共同体层面，巴里·布赞认为，国际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一个更具感染力的术语，它意味着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达到认同的程度，它建立在各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6]建构主义强调共同体是建构出来的，其中文化发挥着独特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认同以及同时形成的价值与情感认同是形成共同体的关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平台，助推文化共同体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那么“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形成？

（一）客观基础：全球一体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习近平历次谈及“命运共同体”时都是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论述的。2013年3月，他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命题时是以全球化作为立论基础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在全球化的多维涵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经典表述，是世界紧密联系连成一体的主要表现。随着交往工具与手段、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增多，国与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从彼此联系到相互依存，再从相互依存到融为一体，全球化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利益、安全、卫生、健康、观念、认识、文化和命运日益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包括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外溢，也是支撑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背景底蕴和精神内核。同时，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这就要求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扬同舟共济精神。正是基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全球性问题不容回避的现实，习近平提出要共同分享机遇、应对挑战，寻求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中国全球方案的内在诉求，“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引领全球化的新型形态，旨在打造命运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源自利益又超越利益，是共同体的最高级形式，本质上是高度认同的文化共同体，一种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依存意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担当精神，一种天下一家、四海归心的理想情怀。“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际合作倡议，带有强烈的文化印记，文化共性的背景不容抹杀。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形成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各民族交往的窗口，书写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共建‘一带一路’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的文化理念，为沿线国家相向而行、互学互鉴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人群的深入交流，使人类超越民族、文化、制度、宗教，在新的高度上感应、融合、相通，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这个新高度不妨理解为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建将为多元文明交汇融合提供更多机遇空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文化密切互动、融会贯通将推动新型全球化朝着互尊互鉴、协同共荣的方向迈进，这一方向最终指向多元文明融为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二）历史基础：共同文化传统

历史文化传统是构成共同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是形成共同文化认同的物质基础。“作为文化传承的‘精神链条’，文化传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仰、规范、秩序和理念的核心要素，凝结了文化给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影响着文化中长期的、普遍起作用的生活方式、观念体系和心理模式等。”^[9]“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一带一路”物质文化遗产是丝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技术推广的实物见证，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一带一路”沿线大量的文化遗产，是东西方交流最直接的载体，是丝绸之路精神和民心相通的历史见证，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基石。2014年6月，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共同申遗增进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传统友谊，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认同合作的纽带和象征。丝路精神是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新时期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10]“一带一路”积淀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汇聚了沿路各国文化交融之果，承载着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灿烂文化的历史记忆，有着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础。古代“丝绸之路”将分散的人类文明连接成统一的共同体，“一带一路”更是对人类共同体历史演进的传承和升华。^[11]有的学者将环中国海文化圈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人种同类，文化同宗，地缘相连，血缘相亲，经济互补互动性强，联系紧密”，这些“共同的拥有”，使之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基本条件、要素具备。环中国海汉文化圈这一文化共同体，至今仍然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共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共同的传统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体民众基础。^[12]丝绸之路作为联结人类主要文明体系的桥梁和通道，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等世界重要文明资源融会贯通在一起，几大文明之间紧密联系，频繁互动，相互借鉴、吸收、碰撞、揉合，历经千年大漠孤烟、云帆沧海的陈酿，在特定的时空长廊中发酵成为沿线国家和民族共享的文化醇醪，化作基础底色渗透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跳动于文化活动的脉搏之中。如东南亚国家至今广泛存在着郑和遗迹，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庙、三宝垄，泰国有三宝港，菲律宾有三宝颜等。这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人民为铭记郑和造福当地的功绩，对他进行旌表纪念，将有关他的故事传说加以神话，进而发展成为一种顶礼膜拜的民俗。这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十分相似。相同文化资源和信仰传承一下子拉近了中外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这就是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元素。“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之间由于在生产、生活、思维、情感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性和相似性，而比较容易在一定的共通层面上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并由此而产生出一定的趋同性、内聚性，形成一定的向心力、凝聚力。”^[13]“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源于文化血脉的相袭相承，共同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其内源一体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信仰认同、风俗习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理念、话语体系等等，这些构成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主要内容。

（三）人文基础：友好交往底蕴

全球一体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气候”，同质文化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土壤”，那么友好交往则是培育文化共同体的“水源”。习近平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深情回顾了丝绸之路的千年友好交往史。“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

于公元前 138 年和公元前 119 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 70 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 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14]跨越时空的友好交往为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千年丝路友好交往的缩影，敦煌艺术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也是全球交往和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敦煌被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誉为“世界四大文明汇流之地”，它的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多国、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印记，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在壁画方面，敦煌壁画既有中国传统题材的神怪画作，又体现了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的艺术风格，也有传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故事，还有受古波斯、龟兹文化影响的服饰、器具、装饰等。^[15]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在敦煌交流融合，成就了敦煌艺术的瑰宝，见证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美美与共的魅力，为今天中国及沿线国家民族加强文化交流融合、共建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良好借鉴。

一个城市无意间成为丝路沿线文化相遇相成的记录者、传承者，遍布“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千万华人华侨更是丝路友好往来的亲历者、推动者。许多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华人，沿着丝绸之路落地生根，成为最早走向世界的华人移民，他们如星星之火，带动了更多后来者，也将携带的中华文化撒播四方。以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为例，福建早期迁移到海外尤其是东盟十国的华侨华人，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往目的国的。目前仅聚居在东南亚的福建籍的华人就有 1000 多万，基于此，福建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要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建设“海外福建”，将华人华侨当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特色优势。^[16]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已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不少人已经成为政界要人、富豪精英、社会名流，他们血脉植根华夏，心系母国文化，不仅有能力、有实力而且有意愿、有热情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拓展人文交流。如菲律宾侨领陈永栽自 2001 年以来，每年出资组织一批当地华侨华人子女到福建厦门、泉州等地相关学校学习中文、书法、歌舞和武术，参观民俗名胜等，培养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爱好，至今已组织一万余名学生来闽学习。^[17]“一带一路”沿线居住着 4000 多万华侨华人，他们掌握多种语言，游走中西文化，通达中外文明，富有家国情怀，具备融汇各方的天然优势，是促进沿线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有力纽带。调动好华侨华人的优势和积极性，凝聚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命运共同体、营造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

（四）现实基础：伙伴关系网络

培育文化共同体，不仅需要“适宜气候”“肥沃土壤”“丰沛水源”，更需要事在人为的辛勤耕耘。伙伴关系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构建的结果。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伙伴关系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相互协调，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支持，还意味着文化上相互理解。^[18]伙伴关

系表面上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协商为特点，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内在上实则以身份认同为纽带，而身份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广泛多样的伙伴关系，通过对话和磋商处理相互间的摩擦和分歧，实现领导人经常性或年度的定期会晤与热线联系、政府部门间高级官员的定期磋商及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宗教、媒体等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密切联系。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内涵的不断拓展，增强了沿线各国增强相互依存的程度，加强了对彼此伙伴身份的认同。“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了合作伙伴们共同建设的事业，沿线国家伙伴关系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不断密切与加强，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依托。“伙伴关系依据内涵可划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一带一路’的布局得益于直接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19]中国目前共建立了 80 多个战略性伙伴关系，其中 50 个是 2013 年以后建立的，基本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大大提高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含金量”。^[20]伙伴关系的建立，增强了沿线国家在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主动性，既可以增强该参与国对与华伙伴关系的认同，也可以加强其对“一带一路”共同身份的认同。

表 1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

伙伴类型	结成伙伴关系的沿线国家	主要特点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俄罗斯	级别最高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巴基斯坦	领域最全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	合作渠道多方式多
全方位战略伙伴	德国	独特性强
全面战略伙伴	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丹麦、南非、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蒙古、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波兰、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面向全球
战略合作伙伴	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安哥拉、阿联酋、卡塔尔	立足长远
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	比利时	全局性强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尔代夫	意愿性强
全方位合作伙伴	新加坡	广泛多样
全面合作伙伴	克罗地亚、尼泊尔、荷兰、东帝汶、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布)	现实性强
友好合作伙伴	日本	合作空间大潜力大
互惠战略伙伴	爱尔兰	强调互惠
新型(创新)合作伙伴	以色列、瑞士、芬兰	可塑性强

资料来源：根据外交部网站、中国日报网站、新华网等整理。

总之，“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植根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基于沿线文化交往实践对文化共性发展走向的判断，“一带一路”所置身的时代背景、所借助的历史基础、所蕴含的人文底色、所依托的现实力量，乃至所指向的归宿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着“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其必要性有据可依，其可行性有

迹可循，绝非空穴来风的白日梦，更非子虚乌有的乌托邦。随着沿线各国联系不断加强，文化、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交汇或交锋日益增多，文化共同体的趋向将更加凸显。

二、“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构建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既有利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软动人”，让更多国家更加心悦诚服地参与进来，让更多项目更好落地造福沿线；又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共商共建的有效性，文化的柔性协调功能可以通过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对差异、矛盾、冲突进行弥合、疏导和化解，最大程度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也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持续性，仅仅由共同利益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只能解决实际的收益问题，彼此间仍旧可能貌神合离，由文化凝聚而成的共同体才是精神相连、民心相通、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如果说经济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步阶段，政治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较高阶段，那么文化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程阶段”。文化共同体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在沿线合作中，应怎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拥有共同文化记忆、共同文化认同以及共同文化精神的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要通过文化互动和整合，在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这既是一个长期的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短期可有所为的构建过程。

（一）实现语言互通是起点

文化事业是一项心灵工程，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首先要加强沟通。语言是沟通的中介，语言相通是“五通”的基础。语言是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是实现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增进理解的纽带。“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只有语言通了，经贸才能通，文化才能通，心灵才能通。“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分别属于九大语系，官方语言就有 53 种，加上数百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各民族语言高达 2400 余种。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仅现场同传的工作语言就有 18 种^[21]。“一带一路”通用语中，除英、俄、法、德、泰、阿拉伯语等语种使用人口较多外，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使用更多的是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大多是不常见的小语种，彼此之间沟通困难。有些语言因政治经济环境变迁，本来是同语同文的，如今已经“相对无语”或同语不同文了。如蒙古国与和中国蒙古族现在只得听懂对话的话，却看不懂对方的字，因为独立后蒙古国受前苏联影响使用西里尔蒙文已有半个多世纪。以西里尔字母作为蒙古语标记的文字与我国蒙古族使用的传统蒙文，即回鹘式蒙文有很大不同。蒙古国议会 2014 年通过法律规定将在 2020 年全面废除使用西里尔蒙文，恢复使用传统文字，以利于传承蒙古历史文化，方便沟通交流。如果说蒙古国的语言尚可以通过回归重建实现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但其他语言却没有这么幸运，既“回不去”，也“出不来”，只能借助翻译进行互通。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是主要建设者，中文也是丝绸之路上使用最多、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积淀最深的语言，汉字文化圈在一定意义上标识着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中文在沿线地带的语言高位是毋庸置疑的。对一些丝路国家而言，学习中文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历史上、现实上、技术上、成本上考虑都是如此。因此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促进中文的国际教育传播。当然语言互联互通也意味着中国对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学习及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学互鉴。

2014 年 3 月，习近平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22]2015 年 10 月，习近平在出席

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23]语言互通,就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既要推广中国语言,也要学习当地语言。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2020年7月,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成立,该中心旨在为中外语言双向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协作平台。“一带一路”沿线语言大多都是非通用语种,实现语言互通的基本方式是语言教育和语言学习,为此一要加大非通用语言教育。随着“一带一路”事业的推进,开展一对一的双向学习十分重要,中文国际教育只能解决别国的语言需求,我国也要虚心学习他国语言,培养更多的小语种语言人才;二要加强区域通用语教育。“一带一路”沿线通用语中除了英语外,俄语和阿拉伯语的通用国家均超过10个。在语言双向互通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区域通用语实现互通见效更快,成本也更低;三是提升机器翻译语言能力。随着计算机运算能力提升和多语言信息资源的爆发式增长,机器翻译越来越靠谱,在个人语言能力提升的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机器翻译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要内外并举、专通结合、人机并重,最大程度地提升语言互联互通能力,使之更好地为文化互通服务,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硬件”支持。

(二) 促进人文交流是纽带

人文交流包括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除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以外在科教文卫体媒等方面的各种合作,是国家间建立长期、稳定、良好人际关系、赢得人心并建立信任的基础手段和人文途径。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24]王毅外长将人文交流视为与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并列的“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支柱。^[25]201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26]2019年5月,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再次表明“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27]2020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提出“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重大倡议,将人文交流合作提升到构建人文共同体的层次,为构建沿线文化共同体指明了方向。人文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共同体,或者说人文共同体包括文化共同体,因为广义上的文化就是人文,狭义上的文化与科技、教育等一起构成人文体系。文化总是与人相关,“文化,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则是反过来,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装备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28]因此文化共同体建设属于人文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方面,总书记“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的思想虽然是在上合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但为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支持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合作架构,成为通向文化共同体的现实之路。

旅游是最直接、最大众的人文交流方式。跨越亚欧非东西方的文化文明、纵贯寒带温带热带的气温气候、山海林沙盆地高原齐全的地形地貌,为“一带一路”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自然资源。“一带一路”连接了全球主要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规模占到全球旅游的70%左右。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旅游成为热点，也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沿线国家赴中国的游客由2013年的903万人次发展为2017年的1064万人次。中国游客到沿线国家的出境游，也由2013年的1549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2741万人次，5年间增长77%，年均增速达15.34%。^[29]2018年，“一带一路”国家赴中国旅游人数1099万人次，中国赴“一带一路”国家旅游人数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9.4%。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中俄蒙等一系列文化旅游合作机制相继建立，中国驻曼谷、布达佩斯、阿斯塔纳旅游办事处以及巴黎、悉尼中国旅游体验中心等先后落成，推进中国与沿线国人文交流合作迈向机制化、长期化、规范化，进一步走深走实。2020年初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沿线旅游受到了较大影响，在利用高科技组织“云端游”、线上博览会、沿线知识竞赛等活动的同时，相关部门可借此机会开展用户调研、策划细分文案，从而开发出适合各类旅行者的产品，也可以趁机加强人员培训和业务整顿，以期在疫情后“报复性”反弹的旅游大军做好充分准备。

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根基与灵魂^[30]，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宏伟大厦的民意基础，关系到整体工程是否稳定持久。现有的不良舆论和工程搁浅等问题，多与人文交流不够充分相关；而“一带一路”率先取得成果的地方、合作进行得顺利的地方，都有人文交流多、民众基础好的特点。因此，要充分发挥好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润滑剂和助力剂的功能，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驱动力和向心力。人文交流贯穿“一带一路”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也是检验“一带一路”建设最终成效的试金石。在此意义上，不断拓展、夯实、加固人文交流合作的宽度、厚度、深度是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根本之路、长远之路。

（三）增进文化理解是关键

文化理解在此也可称为跨文化理解、文化国际理解，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他国、他人文化的接纳学习以及尊重鉴赏等态度与行为。理解是认知是深化，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站在他人立场上对异己文化的悦纳，这是缩小差异隔阂、消除误解误会、实现文化融合、促成文化创新的重要步骤。“一带一路”涵盖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独联体等广阔地域，属“动荡之弧”的是非之地，是各种矛盾的交织之地，加上沿线地理分布范围较广、各国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不一等多种巨大差异，都会影响人们对“一带一路”的评价与理解。这是“一带一路”倡导之初遭遇不解、质疑、批评的原因。“新马歇尔计划”“地缘政治工程”“新重商主义”“中国模式输出论”“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债务陷阱论”等声音曾一度甚嚣尘上，固然有经济诱因、政治借口，但文化隔阂才是深层原因。增进文化理解是打破偏见、消弭隔阂的重要方式。

首先，针对一般民众由于缺乏对“一带一路”的深入了解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和错误认识，除了要及时沟通疏解，畅通信息传播外，还要将加强文化合作、促进文化理解当作一项常规任务和基础工程常抓不懈。可组建“一带一路”沿线广电联盟，联合制作、共步共享电视广播网络节目，让普通民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一带一路”覆盖区域、涉及国家的生产生活、地理人文、政治经济、体育音乐、节日习俗、民族风情，从而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培养共同体情怀。欧洲的文化联合起步早于经济一体化——1948年，海牙大会就强调培养欧洲统一的文化意识；1949年，欧洲学院基金会在布鲁日成立，目标是培养具有欧洲观念的未来人才；1950年，欧洲文化中心在日内瓦落成，致力于欧洲统一思想的交流；同年欧洲广播联盟成立，旨在欧洲范围内实现

重大事件即时直播传送；1954年，欧洲电视联播成立，推动欧洲各国电视节目交流；同年，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成立，为欧洲人共享体育盛事提供了平台。这些机构、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欧洲人民超越国界、民族、地方进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法布里斯·拉哈认为，“正是得益于这一类的创举，欧洲在许多公民眼里成了实实在在、可感可知的现实。在共同的盛大集会中，欧洲公民才能够意识到一个共同空间的存在。”其次，针对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影响左右发展中国家对华认知的现状，中方一方面要缩小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落差，另一方面要拉紧与沿线国家的文化纽带。

“一带一路”的快速见效激起西方国家强烈的防范之心，导致歪曲、抹黑“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舆论不断，沿线国家很容易受到这些负面言论的影响和左右。一些西方人士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要步美国后尘，借助投资和开发进行地缘政治扩张。与此论调相关，一些越南人鼓吹“一带一路”的“渗透扩张”将可能成为越南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还有所谓的“债务陷阱论”指责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为一些项目提供贷款，借此获得对其政治、经济事务的控制权。美国官员与印度学者一唱一合，使许多沿线国家信以为真，十分防范；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喧嚣“污染转移论”，指责中国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是高污染项目，引起一些本是造福东道国的民生项目却因所谓的生态环境原因而延期或搁浅。对此，中方在批驳澄清西方论调的同时，也要从文化上入手，充分利用中国文化中心、语言项目、媒体合作、教育交流创建与沿线国家直接沟通的机制渠道，扭转他们依赖西方媒体接收外界信息、对西方媒体偏听偏信的局面。当他们对中国更加了解、理解，与中国的文化纽带更牢、文化认同更强时，自然就对西方国家的说三道四有了免疫力和分辨力。再次，对于那部分由中国企业、涉外人员言行不当而引发的误解和争议，要敢于自省不足，善于吸取教训。如有的工程项目人员不懂或无视当地规则或宗教习俗，招致人家反对、抗议，影响整个工程实施，还给一些反对人士提供口实。伊斯兰堡伊克拉大学（Iqra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任侯赛因曾以“巴基斯坦：中国的殖民地？”为题撰文，说一些中国工人不尊重巴基斯坦法律、政府人员和警察，自私傲慢，胆大妄为，不讲规矩，污辱了巴基斯坦主权（如轻慢其国旗），有损于中巴兄弟友谊“高于山”的情感。一些人借此批评中巴经济走廊合作是中国殖民巴基斯坦的计划，在民众中产生了较坏的影响。^[31]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巴铁”尚有这类问题，可以想像那些本来就对中国心有不满的人将会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课”是走出去企业、公民的必修课，要将文化理解融入到项目合作、施工管理等环节，充分理解文化差异、尊重他国文化。已经有企业在探索好的做法，如为信奉伊斯兰的员工在施工现场专门设置祈祷室。只有理解、满足不同国籍员工的文化特点和精神需求，尊重他们的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才能赢得沿线支持理解，在彼此理解中促进合作，推动文化共同体建设。

（四）培育文化共性为支点

尊重文化个性与发展共性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沿线是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五大宗教的起源地、九大语系的汇聚地、多元文化的衍生地。沿线各国进行交流合作时，若没有一定的文化共性作为基础，很难进行有效的文化沟通，产生精神和文化上的共鸣。“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必须要找到文化共同点，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异质文化中探索各国文化的交叉地带，例如宗教文化、古丝绸之路的商道文化，等等。”^[32]也有的学者将佛教文化传统、中华医学魅力作为发展文化共性的两个切入点，以此推进文化资源共享，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共鸣。^[33]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国的抗疫经验得到沿线国家的赞赏与借鉴，其中透出的东方文化观、价值观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亚洲国家、沿线国家引以自豪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儒家文化圈的集体主义、克己自律、信奉科学、服从权威的精神，是亚洲国家在疫情防控中应对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与东盟、日韩等国在抗疫中突显的文化共性为其开展官方政策协调、进行民间温馨互动、团结互助合作、联动恢复经济功不可没。因此，“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建设要珍视、发掘共性文化，并以此为支点提升沿线国家文化的亲密度、认同感与归属感。

培育文化共性离不开共同利益的支撑，共同利益离不开共同观念。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文化观念可以促成利益认同，使一国的自我利益与外国利益达成一致，还可以通过合作形成新的共同利益。这是促进“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意义所在，也是现实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尊重国家利益，扩大共同利益，倡导新型义利观。首先，尊重彼此的国家利益。各国都有自己的、本国特有的特殊国家利益，如领土主权、政治制度等。要建立“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必须要尊重各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否则是无法通向共性、达成共识的。其次，要不断发掘扩大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共同利益是沿线各国一致认同的、符合所有沿线国家利益的公共财和公共善，如维护区域和平发展、解决区域贫困问题、治理区域环境污染、打击恐怖主义等等。全球化使沿线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利益交汇日益增多，乃至形成共同利益。这有利于夯实“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决定着文化共同体的根本。最后，倡导新型义利观。“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34]互利共赢是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拓展共同利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只有以此基础才能找到通向文化共同体的正途。“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5]

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越来越被沿线国家和人民所认同，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共性的基础。“‘一带一路’理念中没有民主、良治、价值观维度，却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的表达。中国倡导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统领责任、‘要想富先修路’的思维、民生先于民主的理念、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思想，以及对多元文明的尊重、对南南合作的重视、以发展根除恐怖主义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思维方式等，都通过‘一带一路’实施而得以彰显。”^[36]这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治理之道，萃取于共同文化传统和发展实践，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共性，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支点。

（五）促进文明互鉴是引领

文明互鉴是高层次的民心相通，引领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凝聚多方智慧，为“一带一路”沿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滋养。“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37]“一带一路”共建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原则，主张文明互鉴、和而不同。文明优越、唯我独尊是历史上导致不同宗教、文明之间

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8]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指南。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明，“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中国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39]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尊重包容的重要性，“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40]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切忌“文化中心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我们的传统，一定要以敬畏之心对待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各国各地区本土信仰等宗教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同时注重加强宗教界、知识界、智库界、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交流，发挥爱国爱教的中国宗教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独特印记。“宗教对外交流在文明交流、补充国家外交和‘善巧方便’地以情谊促进民众相互理解和支持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信仰层面推进沟通与理解，进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和平合作所需的跨国族际心理认同基础。”^[41]近年“一带一路”触发了宗教参访热潮，福建宗教团体发起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通过与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对话交流，相互启迪，互鉴共进。2017年，闽南佛学院一行138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5个国家的寺院古迹、佛教院校等进行参访交流。这次交流承前启后，发扬了佛教在推进文明互鉴中基础性作用。^[42]佛教本源自印度，传到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很好融合，不仅得以发扬光大和守正出新，而且还借由中国传播到更多族群和更远海外。佛教的跨国传承是中外文明互鉴的典范，这与西方侵入式的传道截然不同，西天取经是虔诚学习，南洋传经是笃信善成，文明互鉴旨在互通融合、共存共荣，不在于改造替代、吞并归化，体现了真正的文化传承精髓与文明守护担当，彰显“一带一路”文化同体的真义。

“一带一路”是文明之路，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进行的对话沟通、交流互鉴，有助于促使不同文化主体持续互动，推动形成动态融合、生生不息的文化共同体。构建文化共同体不是要凭空打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规范，而是通过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方式，发扬光大古丝绸之路的共同遗产，实现文明互尊互鉴，协同共荣。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互鉴体现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本质，即通过文化多元互动，激发文化创造力，形成一种文明相互观照、文化交融共生的开放包容结构。

总之，全球一体趋势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命题产生的时代背景，深远文化渊源是其形成的前提条件，千年友好往来是“一带一路”联通沿线各国的人文纽带，伙伴关系网络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外交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且贯穿沿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始终，既是各方合作的思想基础，也是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重要标志。它能促进利益共同体建设，保障政治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对于夯实沿线命运共同体的可靠性、凝聚力，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调性、稳定性都大有帮助。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化成作用，从加强语言互通、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文化理解、培育文化共性、增强文明互鉴等方面着手展开行动，切实推进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丰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文化维度。当然,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一个高难度、超复杂的长期过程,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不是一代人或两代人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徐琴、孙绍勇.“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9(11).
- [2] 谭文富.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J].理论观察,2018(6).
- [3] 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J].当代传播,2015(6).
- [4]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3.
- [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9.
- [6] [英]巴里·布赞、安娜·冈萨雷斯·佩莱兹、任东波等.“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J].史学集刊,2005(2).
- [7]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
- [8]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N].人民日报,2019-04-23.
- [9] 孙英春.东北亚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与“文化共同体”远景[J].浙江学刊,2009(4).
- [10]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5-15.
- [11] 许亮.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史[J].学术探讨,2019(3).
- [12] 曲金良.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重建大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24).
- [13] 欧阳康.跨文化理解与交往[J].社会科学战线,1997(6).
- [14]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
- [15] 王旭东.敦煌,丝路流韵袅千年[N].人民日报,2017-05-21.
- [16] 孙虹、陈龙山.丝路新语:海外华侨华人欲发挥“带路”作用[EB/OL].中国新闻网, <https://www.chinanews.com/zgqj/2014/02-27/5888804.shtml>
- [17] 杨辉.发挥侨务工作优势 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J].侨务工作研究,2014(4).
- [18] 门洪华.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
- [19] 曲鹏飞.“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及风险规避[J].行政管理改革,2019(2).
- [20] 王晨光.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J].当代世界,2020(1).
- [21]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18种工作语言是:中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柬埔寨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印度尼西亚语、哈萨克语、老挝语、蒙古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张鹏飞.人心相通 语言先行[N].光明日报,2017-08-03.

- [22] 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N]. 人民日报,2014-03-29.
- [23] 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N]. 人民日报,2015-10-23.
- [24]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9-08.
- [25] 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26/c_1118171527.htm
- [26] 习近平: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 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01.
- [27]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5-16.
- [28] 林坚.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
- [29] 赵珊.“一带一路”带火沿线游[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4-26.
- [30] 人文交流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根基与灵魂——访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N].光明日报,2016-09-22.
- [31] Ejaz Hussain, Pakistan: a Chinese colony? -Daily Times, 2018-04-08, <https://dailytimes.com.pk/225183/pakistan-a-chinese-colony>
- [32] 郑士鹏.“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机制的构建[J].学术交流,2015(12).
- [33] 赵立庆.“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交流的实现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6(5).
- [34] 转引自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3-09-10.
- [35]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6-29.
- [36] 李丹.“一带一路”对区域治理范式的创新:理念、结构、规范[J].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2019(2):43.
- [37]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5-16.
-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 [39]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6-11.
- [40]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5-16.
- [41] 章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化宗教外交构建——以中国佛教对东南亚地区交流为例[J].国际展望, 2019(2).
- [42] 东南亚佛教与中国佛教同源同宗,新加坡佛教更是和福建佛教法缘深厚一脉相承。来自闽地的喜参和尚、转道和尚、同传和尚、禅台和尚、广祥和尚等大德为新加坡佛教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这次外访交流之行,同时也是怀旧回归之旅,进一步强化了中新两国佛教交流互鉴的根基。参见“重走海上丝绸之路”[EB/OL].南普陀在线, <http://www.nanputuo.com/nptnews/html/201706/0309492073499.html>

Basic Conditions and Realistic Path to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LI D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t has objective material basis, profound historical foundation, deeply humanistic foundation and realistic diplomatic foundation. In the specific practice, we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Belt &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by strengthening language intercommunication, boosting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ivating cultural commonalities, and enhancing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word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ultural exchange

作者简介: 李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文化外交。